

火灾“烧”出贪腐案凸显监管失败

如果非得通过一场特大火灾事故才能充分暴露出来,这个代价实在太大了,教训实在太惨痛了。这绝不能成为一种加强安全生产的常规模式,更不能成为一种反腐败的“路径依赖”。

>>头条评论

□潘洪其

昨天,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“11·15”火灾事故相关刑事案件作出一审判决。经审理查明,2010年6月初,时任上海静安区建设和交通委员会主任高伟忠,接受他人请托,违规决定静安胶州路教师公寓节能改造工程承包事宜,该工程随后被整体转包,又被层层拆分、转包,最终酿成58人死亡、71人受伤的惊天火灾惨剧。法院一审以滥用职权罪、受贿罪判处高伟忠有期徒刑16年,以滥用职权罪判处静安区建

设和交通委员会副主任冯伟有期徒刑11年,其他被告人也分别受到刑事处罚。

上海“11·15”火灾是一起震惊全国的特别重大安全事故,它不但“烧”出了城市运行管理和建筑安全生产的软肋,也“烧”出了建筑市场监管执法部门的漏洞,“烧”出了高伟忠、冯伟等监管执法人员涉及贪腐的丑闻。装饰公司经理、项目经理、安全员等有关人员,在建筑施工环节管理失当、违规操作,对火灾事故负有直接责任,自当以重大责任事故罪领受刑罚;而高伟忠、冯伟等人身为监管执法部门的官员和工作人员,因履职不力、执法疲软导致“监管失败”,无疑更是造成火灾事故

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具体分析起来,监管执法部门工作人员“监管失败”主要有两种情况。其一,监管执法人员与被监管者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,不能理直气壮地坚持原则,以硬碰硬。他们有的拿了人家的好处,收了人家的“保护费”,有的收受了人家的重金贿赂,于是“吃人嘴软,拿人手短”,在监管执法过程中乐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对各种弄虚作假、偷工减料的违规作业和违法生产视而不见、充耳不闻。有的监管执法人员甚至在企业中持有明股或暗股,监管执法事实上变成了自己监管自己,自己做自己的裁判,怎能做到公正无

私?这种“监管失败”的情况,在发生“11·15”火灾的静安胶州路教师公寓改造工程中表现得十分明显,在一些地方的矿山、污染企业及酒吧、歌舞厅等娱乐场所也较为常见。

另一种情况是,监管执法人员或者由于责任意识淡漠,履职能力低下,或者慑于被监管者非同一般的权势和地位,而不便或不敢严格履行监管职能,有意无意放任、纵容了被监管者的违规违法行为,进而酿成重大安全事故。如在2009年中央电视台“2·9”火灾事故中,建设、安监等监管执法部门工作人员的“监管失败”,大体上就属于这种情况。而在上海“11·15”火灾事故中,先后承包和

整体转包教师公寓改造工程的两家建筑公司均为国有企业,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监管执法的难度,使监管执法人员产生了某种畏难心理,这些因素与上述第一种情况一道,加剧了“监管失败”的态势,进而加大了发生重大安全事故的几率和危险。

无论是哪一种情况,如因降低监管执法标准、放弃监管执法责任而导致安全事故,监管执法人员说破天也难逃失职渎职的罪责。

监管执法人员的滥用职权、失职渎职和贪腐行为,如果非得通过一场特大火灾事故才能充分暴露出来,这个代价实在太大了,教训实在太惨痛了。这绝不能成为一

种加强安全生产的常规模式,更不能成为一种反腐败的“路径依赖”。要全面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,必须大力强化监管执法部门的责任,必须以行政问责、纪律处分直至刑事处罚相“威胁”,向监管执法人员施加巨大的责任和压力,促使他们公正廉洁,严格监管执法,保持“高压监管”不松懈,以尽最大努力避免“监管失败”。同时,通过监管执法部门将巨大的责任和压力传导到生产单位,促使生产单位加强管理,完善制度,加大对安全生产的成本投入,最大限度地预防和遏制安全责任事故。

这应当是上海“11·15”高楼重大火灾带给世人的一个无比沉重的警示。

>>热议

副市长去过60国

四川省宜宾市常务副市长徐进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自称“去过60多个国家”,引发网友围观,宜宾市委宣传部工作人员表示,徐进说去了,那就是去了。不过,刊发该报道的宜宾新闻网随后将“去过60多个国家”这句话删掉了。

反正我信了

“去过60国”你信不信?不信有不信的理由。一则,一些官员吹牛皮吹习惯了,反正又不上税。二则,为了有意抬高自己身价,炫耀自己与众不同见多识广,也有可能“被出国”。三则,副市长既不是外交家,又不是旅行家。哪来这么多时间与精力?四则,副市长不是比尔·盖茨,工资毕竟有限,甚至要养家糊口。一笔不菲的盘缠从哪来?

“去过60国”你信不信?我反正信了。一来,副市长并非酒后失言,也非茶余饭后的信口开河,而是接受中央

记者采访的正规场合。二来,办公室工作人员的佐证“没错啊,他说去了60多个国家的话就是去了啊”,以及宜宾新闻网匆忙删掉这句话的“此地无银三百两”。三来,当“不花白不花,白花谁不花”,成公费出国考察“潜规则”时,钱还算问题吗?四来,有“完成出国指标”,有“化装旅游”,出访的名义更有考察、学习、培训,实在没有借口,也可以招商引资、商务考察、对口交流等名义周游世界。“去过60国”又稀奇什么?(陈文祥)

成了炫耀的资本

一个地级市的常务副市长在当地算有身份的人了,加上去过60多个国家,更是身份的象征。我想,有些小国家的外国元首或许也没有去过60多个国家,这位副市长可以说游遍“全球”了。我们常说,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,这位副市长达到人生目标了。一个官员难道非要走遍天下,才能治理一个地区吗?我想,非也!官员出国一方面是为了身份需求,另一方面,我们的官员深知公款出国旅游的道理,有权不用过期作废,打着考察、学习的旗号,实际是游山玩水。

国家相关部门曾经多次三令五申禁止公款出国游,

但我们有些官员就是我行我素。中纪委日前印发了《用公款出国(境)旅游及相关违纪行为适用〈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〉若干问题的解释》,明确界定了“用公款出国(境)旅游行为”,即是指“无出国(境)公务,组织或者参加用公款支付全部或者部分费用,到国(境)外进行参观、游览等活动的行为;其中包括无实质性公务,以考察、学习、培训、研讨、招商、参展、参加会议等名义,变相用公款出国(境)旅游的行为。”我想,徐副市长又有多少是打着考察、学习、研讨的旗号出国的呢?(徐志翔)

不能一删了之

如果是花个人的钱,将全世界都走遍,也不会引发质疑,反而会使人敬佩,但徐进却是一位官员,他凭什么去过这么多国家?

官员出国,如果是公事,如果是符合规定的,倒也无所谓。特别是在每次出国考察之后,在网上晒一下出国考察报告,同时显示并没有出国旅游,那就让人佩服了。但恐怕徐进很难做到这一点,“脱口而出”的自豪之

■本版投稿邮箱:zhangjinling@qlwb.com.cn

故宫,你受累了

公共专栏

□刘洪波

打破碗说碗,打破碟说碟。这回故宫打破了一只盘子,国家一级文物。

盘子7月4日就打破了,到7月30日才被网友微博爆料,故宫说,“已经看到了这条微博。是否属实有关部门正在抓紧进行了解。”第二天,故宫证实,盘子是在无损分析测试时操作失误挤破的。

故宫很老,办事情就是老到。这不是指打破盘子,而是指“已经看到了这条微博”。从不置可否到证实出事,大概是要商会决定的吧。现在的解释是,事情不公开,因为“小段(操作人)思想压力非常大”,要调查清楚,要“保护孩子”。嗯,不错,谁能说科研人员有失误,不该关心呢?但事情先通报,告知“原因正在调查中”,也是可以保护的。

故宫讲了很多话,每一句都可疑,一句一句去驳,没必要。上回失窃门、错字门、会所门,故宫就表现出优良传统了:凡有坏事,必须扯七扯八。讲原因,讲委曲,扯不过了就怪责下属部门,长官总是光荣正确,侃侃而谈,振振焉,略无愧怍。

上回“三门”迭发,我说过故宫文不足写对锦旗,武不足应对小偷,可谓“文武双失”。但文物研究方面还是没有毛病的,这才是故宫的特擅之长啊。这回再加一个,文物研究还要连文物都搞坏,“三管齐下”,总算是面面俱到,没有“拖后腿”的了。

舆论都在追问故宫是否有瞒报,认为瞒报比损坏文物更加恶劣。对此,故宫与大家是有高度认同的,所以强调不存在瞒报,不存在封口。虽然,我也如故宫所说,“不合适”地认为故宫存在瞒报和封口的情节(故宫说“不想在大范围内让大家知道”,这就是瞒报和封口的另一种说法),但把注意力

集中到是否瞒报,又未免太过狭窄。

央视记者就打破盘子问“故宫有没有责任”,故宫的一个副长官说“我们没有瞒报的意思……一级文物损坏怎么可以瞒,谁也没有长几个脑袋”。这就是聚焦于瞒报的效应,打破盘子事件,变成单纯的有没有瞒报了。

如果瞒报能够确认,故宫应当受到追责。而我的问题是,就算我们不能认定故宫的瞒报行为,难道故宫的长官们就可以一派坦然?打破盘子,故宫要不要负科研规范和文保程序不健全的责任?而且,像故宫这样一个国家级博物机构,连续发生不虞事件,安保混乱、文物被损,就算主管机关从宽计议,不予追究,内部批评,温婉有加,就算长官们无行政责任,法律责任可负,难道就没有一点“脸面”的责任、道义的责任?难道就不会自觉管理无方,心生惭愧?是什么力量将这些长官们训练得如此落落大方,或者是何种政治逻辑将无所自责的人才擢拔上场?

故宫当然不是这个社会的例外,虽然人们不免总要认为这是一个顶级文化单位,因而应该会有一些文化风度或者文士雅行,然而长官就是长官,故宫的长官,大学的长官等等,与所有的长官一样,也是通过同样的长官体制而产生,因为同样的长官体制而质地坚强。

换个角度看,我们现在对故宫打破一个盘子万炮齐轰,故宫恐怕还会感到不平。在这个社会,不知有多少比打破一个盘子(哪怕是价值千万的盘子)要恶劣许多倍的事情,群死群伤都是经常发生的,未必能够被口诛笔伐。打破盘子后的愤怒,某种程度上算是“社会焦点的代用品”。当我们不能关注真正的要事,我们就来关注一只盘子。把目光聚集到盘子身上,比聚集到另一些事情身上好,这就是“打破盘子说盘子”的社会功能。

故宫,你受累了。

乘客关心的不是高铁上座率

>>个论

□晏扬

京沪高铁迎来开通“满月”,铁道部发布消息称,京沪高铁开通运营一个月以来,平均上座率达到107%。但据多家媒体报道,现在京沪高铁“每趟都有大量余票”,二等座、一等座出现超过70%的剩票,而商务座基本上是在“运凳子”。(8月2日人民网、《东方早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)

初看“平均上座率达到107%”这个数字,我还以为京沪高铁车票供不应求,不得

不卖站票,很多人宁肯站着也要乘高铁。通过查阅相关新闻才知道,“107%”这个漂亮数字原来是一个自娱自乐的游戏。

所谓“列车上座率”是指购票上车的旅客人数与列车定员的比率,京沪高铁列车途经多个车站,每个车站都有乘客上车、下车,把每个车站上车的乘客人数相加,再除以列车定员,就得出列车上座率。

这就像一家餐馆,总共有10张桌子,做了一天生意,从早餐、午餐忙到晚餐、夜宵,一共迎来了11桌食客,店老板于是自豪地对外宣称:今天的生意真好,顾客盈门,

桌子都不够用了!现实中不大可能有这样自欺欺人的餐馆和老板,但现实中有很多部门和官员热衷并且擅长在统计数字上做文章。

说京沪高铁上座率达到107%是弄虚作假,显然过于严厉了,因为没有证据表明人家在数据上做手脚,人家只是采用了一种比较“高明”的统计方法。另一方面,老百姓也不是傻子,有乘坐高铁时的所见所闻,被人欺骗的可能也不大。实际上,京沪高铁的上座率是真是低,跟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呢?他们最关心的是安全和准时,而不是上座率、速度和效益。

自从去年楼道里又添了几条线路之后,宽带竞争明显白热化了。今天有公司上门在小区各个楼洞贴上宣传资料,明天准有另一家公司工作人员出现,把自己的材料覆盖其上,后天第三家公司一准来个“士兵突击”。时间一长,楼道墙壁上贴满了厚厚一层。最后来个破烂王“慧眼识珠”,全揭下来卖给了废品站。笔者认为,同行相煎,费钱财费人力,何苦!倒不如各自在服务质量上多下功夫,这种宣传战实在得不偿失。(郑德帅)

文明在细节

在杭州上学时,经常看到这样一番景象:在没有红绿灯的斑马线前,汽车要么减缓速度,要么停下来,司机向行人招手,示意行人先走。每每这时,心里总有一股暖意,这是怎样一种礼让三分的文明境界!然而,放假回到老家,走到汽车站附近的马路上,却令我失望至极。斑马线经过风吹日晒、车马辗轧,已经看不清楚,却不曾修缮。人流密集时,车来车往,险象不断。

斑马线是否醒目,机动车让人与否,表面上看是小事一桩,但它却关乎城市的面面。很多城市把文明的标准理解为楼高路宽,其实文明更多体现在细节上。

(张乐臣)

以培训为名

接某培训机构通知,说要在近期举办有关政策宣讲培训班,时间五天,培训费800元,前两天进行理论学习,后三天到红色旅游区实地参观考察,请有关领导参加。这样的培训班与其说是培训,不如说是变相旅游。

(朱永胜)

■本栏目投稿邮箱:shifengmeipi@hotmail.com